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俞可平 主编

国将不国？

D. 赫尔德 J. 罗西瑙等 / 著

GUOJIANGBU GUO

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The intuitive explanation of the simple. If a dollar is taken away from a worker's expenditures by the amount of hi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f this dollar is given to a worker, the amount of his marginal expenditure on income depends on these marginal propensities. If these marginal propensities diverge, statistical models based on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show that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 on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 on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国将不国？

D. 赫尔德

J. 罗西瑙等 / 著

GOUJIANGBUGOU

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江西人民出版社

14274/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美)
罗西瑙等著;俞可平等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210-02831-5

I. 国… II. ①罗…②俞… III. 国家理论—理论
研究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720 号

国将不国

——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D. 赫尔德 J. 罗西瑙等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南昌红十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12.75 插页

字数:320千 印数:1-3000册

ISBN 7-210-02831-5/D·458 定价:29.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当代西方学界主流权威力作 公共管理硕士(MPA)必读名篇经典

COUJIANGBUGOU

本丛书收录 20 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文章所涉及的理论和观点,均代表西方主流观点,它们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值得有志于学术创新的学者和关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读者认真一读,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采取对应之策。

丛书策划 / 许志锐 林学勤

丛书主编 / 俞可平

内容简介

国家理论与现实政治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总是以某种国家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近年来，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必然结果；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就是无视国家主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所谓的全球治理战略，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逻辑要求。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重大调整均与其新的国家主权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对人类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治体制和政治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书全景式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新的国家主权理论。作为有影响的国家理论已经或正在或多或少地对作者所在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影响。这些理论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外，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该国的政治立场、未来走势提供了较为有价值的参考。

责任编辑

／朱卫东

封面设计

／章海

目 录

译者前言	(1)
------------	-----

1. 全球化与国家	(31)
2. “无权力国家”的神话	(81)
3. 全球化与社会国家	(118)
4. 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	(146)
5. 民族国家的终结	(183)
6. 民族国家的未来	(190)
7. 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	(237)
8. 有缺陷的国家	(250)

9. 20 世纪 90 年代的联合国：积极的世界 主义和主权问题·····	(270)
10. 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	(312)
11. 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治理·····	(342)
12. 21 世纪的治理·····	(370)

译者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地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统治和治理的主体、结构、方式、过程和意义,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特别是对17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近代以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民族国家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领土、主权和人民。任何独立的政治体要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国家的领土是独立而不受侵犯的;在这个独立而确定的领域中必须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机关,它代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主权不可分割,不受他国的干预;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公民,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仅受本国法律和本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只有在隶属于一个领土国家时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因而公民通常等同于国民。直到现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们政治想像的基本依托所在。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全球化挑战主权国家的现实,必然地导致人们对传统的主

权国家观念的重新思考,传统的国家理论因而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者至少提出了以下五种不同观点:第一,传统的国家主权已经开始彻底崩溃,民族国家已经开始终结,国家主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国际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第二,全球化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世界主义”时代,在世界主义时代,不管主权是否存在或是否仍然发生作用,就其重要性而言,它都开始让位于公民的人权,公民个体的人权获得了高于国家主权的地位。第三,民族国家的主权确实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也确实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但国家主权远没有消失,它依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核心和基础。第四,“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全球化不仅没有使国家主权消失,甚至也没有使其弱化;相反,国家主权的属性和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第五,不可让渡、不可转移的传统国家主权正在被新的主权形式取代,国家主权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变得可以让渡和转移。国家主权正在多元化,向上它部分地被转移到了国际组织、跨国组织和区域组织,向下它部分地被转移到了地方和社区。

国家理论与现实政治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总是以某种国家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不管理论家的初衷如何,一种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国家理论或多或少会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仔细地研究可以发现,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重大调整与上述新的国家主权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必然结果;所谓的先发制人战略,就是无视国家主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所谓的全球治理战略,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逻辑要求。当然,真正的学术研

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决不是庸俗的、简单的等同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在提出其新的国家观时,主要是出于学术的动机,因为及时地对现实的变迁作出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这本身就是学者的重要职责。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无论学者如何坚持“价值中立”,任何国家理论都必然会有其现实的关联,或多或少会受到作者所处的国家、地位、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影响。因此,对于本书所要介绍的各种新的国家主权理论,读者应当分别从理论本身的逻辑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两个方面去分析和理解。下面,我们依次摘要介绍本书所收各章的主要观点。

1、全球化与国家

作为一名左翼学者,利奥·潘尼奇在《全球化与国家》一文中不仅对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而且论述了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应当采取的战略策略。

潘尼奇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左翼学者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策略,即把自己对全球化的反思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遵循着资本主义的逻辑。大多数左翼学者把全球化解释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以前的左派似乎可以通过在民族国家的地形上奔跑而到达别的终点;然而现在,由于资本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所以左派不得不学会跟资产阶级一起在全球的地形上奔跑。潘尼奇批评说,实质上,左翼学者的这些反思充其量只能是“如何抓住资产阶级的手、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以至赶上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步伐”。他说,倘若左派要重新组织有效的运动,那么他们不应该是跟上或适应资本主义变迁的步伐,而

应该是发展自己进行广泛和有效动员的能力，以对抗竞争和利润的逻辑，从而使自己最终能够在资本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平等、协作、民主的社会秩序。如果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那么即使以加倍的速度前进，也无法到达别的终点。

多数左翼学者把全球化假设为一个资本藉以限制、逃避或超越民族国家的过程。潘尼奇认为，这种假设可能会在两种意义上产生误导：首先，它往往过高估计了民族国家在较早的时期里控制资本的能力；它似乎认为左派的实践模式在民族国家是完全有效的，由此鼓励在全球层次上也采用相似的模式：这仅仅是一个在新的地形上跑得更快的问题。其次，即使是那些没有这种错觉的人，也常常会忽视一种事实，即：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国家的产物，并且也在根本上重组而非回避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导致了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之间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使左派没有注意到，不仅需要改变自己的国家战略，也需要形成适当的国际战略。

潘尼奇争辩说，任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左派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的尝试，都必须以下面的认识作为前提：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国家干预的本质已改变了许多，但是国家的角色未必就已经销声匿迹。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绕过国家；相反，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仍然相当活跃，资产阶级依然高度政治化。他说：对于这种过程，我们可以用一种类似于理解国家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作用去加以认识。在“自由放任国家”的出现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一种十分活跃的角色，从而使政治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并在法律上与政治上保证了契约权和财产权。现在我们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情况：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借助国家的支持才得以发生的过程；国家赋予全球化以意义，在一些重要的

方面甚至还创造着全球化；全球化包含了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转换，这种转换经常体现为国家权力的集权化和集中化，它们是全球市场规则的必要条件和伴随物。跨国资本所引起的权力集中并没有减损国家的权力；相反，“国家恰恰介入了这一集中的过程”。

针对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被全球化所超越了，因而需要引入一种“跨国民主”的观点，潘尼奇指出，这种观点误解了“国家的国际化”所包括的真实含义。其实，不仅世界仍主要是由国家组成的，而且任何跟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权力相关联的民主，也依然是嵌入在以国家或小于国家的单位为界限的政治结构中的。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倡导“国际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并没有逃离国家；相反，国家一直是现时代资本主义扩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组成因素。据此，潘尼奇得出结论说：左派应当把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重点，放在国家的转型上，而不是超越国家或试图缔造一种进步的竞争国家。必须寻求国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能力的转变，并使这些能力服务于最终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和民主的目标。

2. 全球化与“无权力国家”的神话

当代西方的主流全球化理论断定，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日益弱化，一种“无权力的国家”（Powerless State）正在出现。对于这一断言，琳达·韦斯给予了坚决的反驳。在论述“无权力国家”时，她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民族多样性消亡的说法基本上是一种误导，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神话；与此相反，她力图证明：当今的国际经济实践

并不足以证实使得本土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的全球市场已经产生,从而不足以支持“跨国趋势”的理论。

琳达承认,国家的结构和职能在当代世界确实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她认为所有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国家的性质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是因为国家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生了变化。在琳达看来,国家的作用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国家权力在新国际环境下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她以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为例,来说明这样一个完全与主流理论相反的观点:强有力的国家正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键性力量。“全球化”往往是国家在推进其公司国际化战略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有时就蕴涵在国际化的国家能力中。

琳达还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论证“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她说:从全球流动的规模上讲,1913年以前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同战后及最近期间的流动并无二致。大量的研究同时表明,在某些方面,早期国际开放的水平并不比今天逊色。对一系列工业化国家而言,1913年的出口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973年所达到的水平。更有甚者,在战后,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贸易一体化的趋势一直在减弱。尽管世界贸易比产出总量要增长得快得多,但它的增长实际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在减慢,其比重从1965—1980年的1.65下降到1980—1990年的1.34。

根据琳达的研究,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恰恰是与全球化趋势相违背的,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其说是国家间差别基本消失的“全球化的世界”(the Globalized World),还不如说是国家

间的差别依然十分突出的“国际化的世界”(the Internationalized World)。世界经济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一种不断区域化的经济,而不是“国界和地缘在经济拓展中变得无足轻重”的全球化经济。首先,从生产的国内基础来看,即使我们承认,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民族国家的经济比过去更加一体化了,但在所有的(除了规模最小的)国家经济中,贸易只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小的一部分。在日本、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甚至更少。这意味着,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经济中,大约90%的产值仍是由国内市场所消化。由此看来,生产的国内基础依旧像过去一样重要。其次,从南北差异来看,一方面,全球化预示着北方与南方更加均衡地发展,而事实上,世界贸易、生产和投资仍高度集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也就是说,集中在富裕的北方。从1970年到1989年期间,北方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81%上升到84%。投资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在同一时期,大约90%的投资流向北方国家。最后,从区域化程度来看,以北方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和投资自身也变得日益集中,形成区域内向发展模式。比方说,现在,欧洲内部国家彼此间的贸易大约占其总出口贸易的62%。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区域内贸易,相对于美—日和美—欧贸易总量,其比重从1980年的68%升至1992年的79%。

对于“无权力的国家”理论,琳达提出了三点强有力的批评:第一,这一理论过分夸大了早期国家的权力。全球主义者往往通过夸大国家以往的权力,来表明当今国家权力的式微。第二,过分夸大国家间反应的一致性。琳达看到,并非所有的政府都追随新自由主义教条,除了东亚的NICs外,德国和日本也远离凯恩斯主义。第三,这种理论过分强调政府的无能为力。琳

达自己的结论是：在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差别似乎更显著了，而不是相反；因而，它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目前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变化了的国家作用同18世纪自由主义者所直面的国家作用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就是：不存在某些全球主义者所断言的国家权力的衰落，而不过是一种严格限定了的国家权力。民族国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更为关键；它不仅不会阻碍世界经济，反而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同国家体制变革的进程是国家的适应性不断发展的进程，而不是向新自由主义单一模式趋同的过程。

3、全球化与社会国家

与上述两位左翼学者一样，戴维·阿姆斯特朗也试图挑战下述这种论点：全球化进程正在威胁国家主权，使国家主权变得毫无意义。在《全球化与社会国家》一文中，阿姆斯特朗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提出了“社会国家”概念，并得出了全球化进程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强国家主权的结论。

阿姆斯特朗赖以建构其“社会国家”观的理论前提，是把国家也看做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国家不仅是一个法律实体，也是一个社会行动者，能够通过其独特的主体间社会化过程，来认知、学习、评估、安排并处理所有事情。正像国家内部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具有主体性一样，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任何社会在给予其成员主体性意义和认同时所扮演的角色，国际社会相对于其成员——国家——也具有同样的角色。国家应被视为国际背景之下同时具有社会性和自利性的实体，其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有助于确定和维护国家的认同，同时也会影响和改变这种认同。正像国内社会中每

个成员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斗争一样,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也都在最终围绕主权和期望获得主权国家资格而展开斗争。这些斗争表明了国家主权的可欲性和重要性,它最有说服力地证明全球化力量尚未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或毫无意义。

阿姆斯特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其建构主义的社会国家理论进行辩护:第一,把国家比喻为社会行动者具有分析上的益处。尤其在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比喻能将其他情况下不可能的复杂现实缩小到可以控制的范围。第二,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现实相吻合,虽然并不完美,但已足够证明其应用的有效性。第三,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所具体化,它们在国际关系的交往中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例如,美国同日本的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可能是由不计其数的团体和个人所代表的很多不同观念、利益和行动所构成的,每个国家都被另一个国家的个人设想为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个人尤其是那些负责对外政策者,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上述相互认知的原因,接受了别人赋予的角色和特性:他们自认为代表自己的国家行事。

阿姆斯特朗最后指出,那些贬低国家重要性的全球化理论家所犯的根本错误,是将全球化视为巨大的、相互关联和不可阻挡的力量,而国家则是孤立的个体,在全球化这种无比强大的进程面前显得极其脆弱。但是实际上,全球化面对的也是同样强大的相互联结的国家体系,这些国家通过与该体系所独有的规则和过程相一致的社会互动来相互学习并确认作为一个国家的意义。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国家面对强大的全球化力量所具有的持久性以及国际社会变化和转型的性质,只有在全球化和国家的不同特征以及两者的互动为人们完全认识之后,方可被充分理解。

4、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

简·阿尔特·斯科尔特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无论是全球化的原因,还是后果,都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剩余积累的动力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特别是国家的活动方式。只有通过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对国家的深刻影响。

10 首先,资本主义助长了跨国关系的生长,以至于近几十年来各国的公司越来越追求全球销售的可能性。由于全球市场的扩展,分散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消费者可以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商品。其次,尽可能地减少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这一资本主义动力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为了能够把生产部门设在劳动力成本、税收、管理制度和其他因素都最为有利的地方,企业推动了全球交往、组织、金融的发展。通过所谓的“全球资源”,企业从世界各地汲取了它需要的原材料、资金、设备和服务。最后,由于在跨地域空间的追求中产生了更多剩余积累的机会,资本主义因此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逻辑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又同时在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斯科尔特指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跨国界关系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重心正在从“货物”(传统的贸易和工业)转向“无形产业”(金融、信息和通信)。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变化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它们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跨越了距离和国界。对资本主义来说,全球化的最后的和十分重要的后果是货币与特定的领土空间的分